

吴荣臻总主编

苗族通史

第二部

卷三 拓土立国期（上） 吴荣臻 吴曙光 主编

卷三 拓土立国期（下） 吴曙光 吴荣臻 主编



吴荣臻总主编

苗族通史

第二部

卷三 拓土立国期（上） 吴荣臻 吴曙光 主编

卷三 拓土立国期（下） 吴曙光 吴荣臻 主编

（讨论稿）

目录

卷三 拓土立国期（上）

前 言	1
第三编 “铜头”部落	3
第五章 铜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3
第一节 铜石并用时代文化遗存	3
第二节 “衡山”、“汶山”间的青铜器文化遗存	6
第六章 “铜头铁额”的九黎、三苗	8
第一节 铜石并用时代的九黎部落	8
一、苗夷文化大融合	10
二、苗族始祖蚩尤	12
三、奋战中原	19
第二节 青铜器时代的三苗国	23
一、三苗国的建立及古代苗族的形成	23
二、三苗国抗击唐虞夏商南下征剿及其灭亡的主要原因	32
三、三苗国遗民的去向归属	35

卷三 拓土立国期（下）

第四编 钢铁古国	43
第七章 荆楚铜铁器文化遗存和钢化技术	45
第一节 荆楚铜铁并用时期的文化遗存	46
一、荆楚青铜器的地下发现及铜矿的开采和铸造技术	46
二、荆楚铁器的地下发现及铁器的冶炼技术	50
第二节 荆楚的钢化技术	55
一、炼钢技术的重大发明	56
二、钢铁广泛使用，生产划时代发展	57
三、锋利无比的军事武器	58

第八章 楚国的建立	59
第一节 三苗遗民 熊楚兴起	59
一、鬻熊为三苗遗民,“熊楚”之祖	59
二、拓土立国 雄踞江汉	65
第二节 楚统一南疆 挺进中原	73
一、收复三苗故地	73
二、专攻华夏 挺进中原	79
三、修筑楚方城 问鼎中原	90
第三节 楚国中衰与复兴	94
一、内乱外扰国势衰弱	94
二、蛮夷自重、楚国中兴	102
附:楚国疆域全图(鼎盛时期)	110
第九章 楚国灭亡	111
第一节 楚国灭亡的历史过程	112
一、连横失败 秦楚开战	112
二、合纵失信 诸夏犯楚	115
三、游说六国 事秦攘楚	116
四、怀王赴秦 困死异国	119
五、楚都三迁 终归秦灭	121
第二节 楚国灭亡的主要原因	124
一、文化渗透 蛮国夏化	124
二、政体腐化 拒绝革新	126
三、腐败忌贤 楚才他用	127
四、亲善诸夏 封君叛离	131
五、连横亲秦 四海归一	133
第十章 楚国历史成就(一)——楚国政治的重大建树	135
第一节 走出了适应自身发展的特殊道路	135
一、楚国没有全面经过奴隶制社会	135
第二节 开创了法制的文明国度	146
一、楚国从“政治宗教”很快上升到“法治制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国方略	147
二、楚国法律制度制定的历史条件	149
三、楚国法律制度形式与内容	156

四、法治精神.....	161
五、变法	165
六、楚国法律制度的历史影响.....	167
第三节 制定了保障国计民生的经济制度.....	172
一、土地制度.....	172
二、税收制度.....	175
第四节 建立了有民族特色的国家，行政体制.....	179
一、置官制	180
二、首创“县”制及其“里”、“社”制.....	184
第十一章 楚国历史成就（二）——楚国经济的巨大成就.....	186
第一节 遵循规律尊重民心，加速经济发展进程.....	186
一、发展进程.....	186
二、物质生产.....	189
第二节 借助地利，改造自然，修建了宏伟的水利工程，水运四通八达.....	190
一、水利工程.....	190
二、水运交通.....	194
第三节 发展商业、手工业、加强流通，城市建设，金融贸易一体化.....	194
一、手工业成就.....	194
二、城市建设.....	204
三、市场贸易.....	206
四、货币交易.....	208
第十二章 楚国的历史成就（三）——楚国科技文化成果.....	211
第一节 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创新.....	211
一、火能在冶炼术中的开发及综合运用.....	211
二、铜铁锻造的成果.....	215
三、水能的开发及其综合运用.....	218
四、天文、历法.....	221
五、医药	228
六、尚武	231
七、数学	235
第二节 文化艺术成就	241
一、哲学	242
二、楚国文学.....	252

三、楚国语言文字.....	254
四、艺术	255
五、楚国巫风.....	262
第十三章 楚国名人传略	266
第一节 政治军事家	266
鬻熊(鬻子)	266
熊绎	267
熊渠	268
熊通	269
楚文王(熊贲)	271
楚穆王(商臣)	272
楚庄王(熊侣)	273
楚怀王(熊槐)	278
吴起	281
李斯	282
令尹子文	283
第二节 哲学思想家	284
老子(老聃)	284
庄子(庄周)	285
荀子(荀况)	287
第三节 科学家	288
许行	288
甘德	288
第四节 艺术家	289
伯牙(俞瑞)	289
第五节 爱国主义志士——屈原.....	290
一 初登政坛,促成六国二次联盟.....	291
二、草拟《宪令》,疏流汉北.....	292
三、再度使齐 卧轍死谏.....	294
四、流放江南 投江汨罗.....	297

前言

中国古代铜器文化源远流长，绚丽璀璨。铜器又可分红铜、青铜、黄铜。特别是青铜器文化，自身有着一个完整的发展演变系统，同时又表明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有着永恒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我国考古学家在半坡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距今 7000 年左右的金属片^①。同时在半坡附近的姜寨以及山东龙山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这样的金属片。中国史学家们大都地把铜器时代的上限定为公元前 3500 年，但仰韶和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铜片，它们的成份中大都含有锌、锡和铅。这表明，在那样时代的早期，我们的祖先，已经掌握了铜的冶炼技术。我国不少史学家也是这样认为：“中国古代的居民可能在青铜时代之前，已有很久的使用金属的历史”^②“比较纯的红铜或红铜与其它金属（锌、锡和铅）偶然的或有意的结合，可能在中国史前史上相当早的时期，或至少在中国的陶工能在他们的陶窑里生产能够熔解含有这些金属成份的矿石温度的时候。”^③已经发现的黄铜片年代，还不能说就是最早的，因为埋藏在地下几千年乃至上万年的文物不可能全都发掘出来作比较，肯定还有许多文物没有被发现。未被发现的地下文物年代早晚尚未可知。我们只能根据已发现的文物最早的年代定为上限。因此，根据仰韶文化遗址中已发掘铜片碳 14 测定的年代，我们把铜器时代的上限定在公元前 5000 年。

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我们的祖先们已经使用了天然金属。后来学会了制作纯铜器。古文献中载有“蚩尤作冶”（《尸子》）、“蚩尤以金作兵器”（《世本》），蚩尤似是真有采铜、作冶、作铜兵的事。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大约在公元前 5000 年——前 3500 年左右，我们的祖先已经知道了铜，并且已会制造简单的小件铜器。铜具有美丽的光泽，又富有延展性，可以经过锤炼做出很细很薄的器具。铜器用坏了还可以回炉重新锻打或铸造，以做成新的器具。这些都是传统的石器所不可比拟的。纯铜熔点为 1081℃，在当时并不是很容易达到的。所以在铜器发明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所能看到的仅仅是一些很小的器具如小刀、锥、凿、钻、指环和手镯等，从成份来看，大多数属红铜，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从天然铜块制造出来的；有些则含锡、铅、锌、铁等金属物质，但那是不是人们有意识地制造的合金还很难断定。或者是矿石本身不纯所致也有可能。即使是蚩尤部落已掌握了开采和冶炼铜矿的技术，但当时也无法推广和普及，这种在当时极为高新的技术只是仅仅掌握在蚩尤部落的少数人手中。大多数地区大多数人尤其是蚩尤集团以外的其它部落是办不到的。

纯铜质地柔软，不能取代石器。因而在早期使用铜，还是与石器并用，尚处于铜石并用时代，或称金石并用时代。这情况大约一直继续到夏代以前，^④从那以后，人们已经学会或者是蚩尤集团的冶炼技术外传至其它部落，我国广大地区大都学会制造青铜器，从而进入了我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青铜时代，普及全国多数地区特别是中原地区的青铜时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夏、商周、春秋三个时期。然而地下发现和史料证明，苗族先民使用铜器和冶炼术的发明要远早于华夏，远在三代以前的

^①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出版社。第 4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 年第一期）

蚩尤和三代时期的三苗时代。战国至秦汉，虽然铜器尚盛行，但只能算是铜器发展史的余辉。这个时期，实际上已进入以铁器为标志的铁器时代了。早期的铜器使用，见诸于史的只有蚩尤部落。到了青铜器时代，华夏乃至全国诸多民族的先民，均已广泛开采或使用了，成了中国历史绚丽灿烂的一页。在整个的中国铜器时代，恰是以蚩尤为始祖的苗族先民拓土立国和古代苗族形成的伟大时代。具体来说，就是九黎三苗时代。九黎又称古三苗，笼而统之说来，即三苗时代。苗族在这个时期里，对冶金技术的发明，对开拓祖国疆域和为后建立一统制的国家政权作出了极其伟大的贡献，在整个苗族历史中，写下了最辉煌的篇章。

第三编 “铜头”部落

第五章 铜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大约从公元前 5000 年开始，我国的远古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铜石并用时代。

在铜石并用时代，石器制作技术日臻完善，铜器铸造业已开始兴起。农业生产进一步提高，物质文化的内容逐渐丰富起来。不同地区之间和同一地区、同一人们集团内部的分化都明显加深，而家庭的结合则日见稳固。从前分散的部落逐渐结成联盟，中国聚落和城堡相继出现，掠夺性战争愈演愈烈，最后导致了原始社会的解体。

铜石并用时代，苗族先民已经历了苗文化北移和苗夷文化大融合的伟大变革。蚩尤一统九黎，缔结成了“九九八十一个兄弟”部落联盟，并为了开拓黄河中下游这块肥沃的土地，与炎帝黄帝发生了大规模的相持甚久的部落战争。

第一节 铜石并用时代文化遗存

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已发掘的铜器甚少。到目前为止，人们能从地下发掘中所能见到的铜文化遗存，最早是西安半坡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一小片金属，以及与其时代相当的姜寨发现的金属园片。此外，在山东龙山文化遗址中，也有所发现。姜寨的那块金属片，是一块残黄铜片，见于姜寨半坡类型的一座房子。发现时，它紧贴在已被烧成红色的坚硬的 F29 居住面，嵌入居住面表层，无疑应属半坡类型时期。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经过反复实验，认为“早期黄铜的出现是可能的，只要有铜锌矿存地的地方，原始冶炼（可能过重熔）可以得到黄铜器物”^①黄铜是铜和锌的合金。姜寨的铜片含锌 25%，确属黄铜。从我国冶金发展史来看，一些史学家认为姜寨的那块铜片还不能认为当时已具备了冶铸黄铜的技能。其理由有二：

其一，锌的冶炼是比较困难的，锌的熔点是 420℃，沸点约 950℃，比其它的任何金属要低得多。为了从矿石中还原锌，需要用木炭加热到 1000℃。这超过了它的沸点，故一部分变为蒸气，另一部分则很快转化成锌的气化物，因而得不到纯锌。至今，锌的生产有火法和水法两种。水法炼锌是二十世纪初发明的，是将氧化锌用硫酸浸出，净化后电解得到锌。火法是用闪锌矿（硫化锌矿）、菱锌矿或炉甘石（均为碳酸锌矿）熔烧成锌的氧化物，然后在几乎密封的容器里加热到 1000℃~1300℃，

^①（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1 年第 3 期。）

使之还原成气体，在容器的另一端保持温度高于锌的熔点，则蒸气很快地凝结成金属。中国是世界上采作火法炼锌最早的国家。明代称锌为倭铅，《天工开物》记载：“每红铜六斤，入倭铅四斤，先后入罐熔化，冷定取出，即成黄铜”，宋元时期未能掌握冶炼金属锌的技术（个别的分析和史籍记载却表明，早在北宋时期，金属锌可能已经在民间使用。见王：《五铢钱化学成份及古代应用铅锡锌考》，《科学》1923年第8卷第8期；章鸿钊：《再述中国用锌之起源》，《科学》1925年第9卷第9期；《中国冶金简史》，科学出版社，1978年。），仍用炉甘石和赤铜铸造黄铜。宋代崔《外丹本草》说：“用铜二斤，炉甘石一斤炼之，即成石一斤半”。元代《格物粗谈》记载：“赤铜入炉甘石，炼为黄铜，其色如金”。由于炉甘石中氧化锌含量低而且不稳定，用以制造黄铜，成分不易控制。只有能冶炼金属锌以后，才可以大量制造黄铜。用炉甘石和赤铜冶炼黄铜，当然不始于宋代。但早到何时，还有待研究。

其二，我国古代铜器鉴定表明：“早期青铜器中不含锌，只有少数晚周或汉代青铜器中出现锌的成分”（R.J.Getten, 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 Vol. 11, P46, 1969.），“东周以前青铜器的含锌量不足1%”（Noel Barnard and Sato Tamotsu, Metallurgical Remains of Ancient China, P.23, 1975.）。

以据上述两点，至少可认为秦汉仍未掌握冶铸黄铜的能力。姜寨的黄铜片，只能被认为是偶然由铜锌共生矿冶炼得到的制品^①。不过，姜寨的这块黄铜片，不管它是“偶然”由铜锌共生矿冶炼得到的制品，还是“比较纯的红铜与其它金属（锌、锡和铅）偶然的或有意的结合”，都同样能够证明，早在公元前5000年～前3500年之间，我们的祖先，已经掌握了铜矿的开采、冶炼和加工的技术。至于当时的技术是否有宋元时期的技术高明，那就勿须作过多的追究了。公元前五千年的技术，怎能与公元后一千年的技术比高低呢？历史是前进的，社会是进步的，这是一条基本规律，我们不能以今天科技水平否定前人有“冶铸黄铜的技能”。或许黄铜还有其他的成因，也未可知。

至于在陕西、甘肃等地所发现的大致在距今六、七千年的铜文化遗存，这些金属是当地早期冶铸的，还是从我国东南方带去的？目前还不便做这样的推断和结论。不过，多数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的见解却是比较一致的。吕思勉先生认为：铜的使用“南方似较北方为早。”“北方知用铜，系由南方传授，则似无可疑者。”“北方之用铜，至东周时，尚远在南方之后。”^②张正明、刘玉堂先生也认为“黄帝用铜较蚩尤用铜稍晚，这是毫无疑问的。”^③这种铜器是不是黄帝部落打败蚩尤部落，从蚩尤部落那里缴获的战利品被带回黄帝本部也未可知。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迁三苗于三危”，由三苗带到那边去的。半坡姜寨一带，恰恰是三苗西迁的必由之路。三苗由中原到甘肃西北的三危地区，走的就是这条路线。苗族通史主编室曾组织考察组，于2000年夏末秋初，专门沿着这条线作实地考察。在考察中发现，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甘肃省陆续出土了许多年代久远，全国罕见的青铜器。如1975年甘肃东乡县马家窑类型地层出土的距今4800～5000年前的铜刀，含锡6%～10%，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人工冶炼的青铜器。甘肃永登蒋家坪马厂类型地层中又出土了一把距今4000～4300年的锡青铜刀。

此外，甘肃还出土了大量齐家文化时期的铜器。这一时期的铜器有红铜、铅青铜、锡青铜和砷镍青铜。冶铸技术有冷锻、单范铸造、简单合范铸等。器型、用途也多种多样，有刀、锥、匕、斧、钻头、矛、环、镜、饰品等。齐家文化时期的铜器表现出当时较为高超的冶铸技术，如铜刀多作扁

①

② 张正明、刘玉堂《大冶铜绿山古铜矿的国属——兼论上古产铜中心的变迁》

③ 张正明、刘玉堂《大冶铜绿山古铜矿的国属——兼论上古产铜中心的变迁》

体长条形，一端尖锐，另一端穿孔可安木柄使用。铜斧刃薄锋利，器身厚重，一端有精美的对钮，用于安装柄把。此间出土的一面圆形铜镜镜面光滑稍凸，直径 60.3 毫米，边缘厚 0.52 毫米，显示出高超的铸造工艺水平。这面铜镜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凸面镜。

出土于齐家坪的人头形柄铜匕，长 14.6 厘米，柄端雕刻成人面形，长直鼻、圆眼、人嘴，具有拙朴的艺术风格，是中国最早的青铜人像雕刻品。史料表明：从鲁、鄂或经豫冀晋陕而至甘肃，在这一带不仅出土了中国最早的锌黄铜、锡铅青铜器，还曾率先发明了冶铸、装饰和镶嵌等三大冶炼技术。值得令人深思的是，在甘肃天水至永登一带，至今还留有三苗后裔，尤其是永登县的“薛家湾人”还保留了一部分古苗俗和古苗语^①。古代苗族或其先民发明了金属冶炼术，还可以从苗族语言中得到证实；苗语对整个金银铜铁锡都有专用名词。苗语东部方言称“金”为“革”；称“银”为“”；称铜为“董”；称“铁”为“络”；称“锡”为“lia”……。我们知道，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当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引进他族他国的先进技术或先进物品的同时，必定会引进他族他国的语言。苗族不仅仅对五金有自己的专用名词，而且对金属锻造和冶炼还有自己的专用术语，譬如言“铸”为“bia”；言“锻造（打）”为“铛”等等。汉语的“打”苗语直译为“保”，如“打球”为“保球”；“打米”为“保祚”，“打岩”为“保柔”等等。可汉语中的“打铁”一词，苗语不是直译为“保络”，而是称为“铛络”；称汉语“铸铁”方式叫“bia 络”；如此等等。这充分证明了苗族冶炼技术不是从汉族那里引进的，而是本民族自己早就有了的。冶炼是一门技术较高的科学，一般来说，汉族比苗族先进，苗族很多东西大都是从汉族那里引进的。譬如辣椒，苗语东部方言叫“海椒”“哈椒”，还是辣椒的变音，而有的地方苗语方言叫辣椒为“社咱”，“社咱”直译成汉语即从客家（汉族）那里带来的象山花椒那样的东西。一语道破本原。汉语也是这样，譬如“麦克风”，“马达”等等，一看便知是从西方引进的。据此，从语言学的角度来分析，苗族发明冶炼术是可信的。况且“蚩尤作兵”之类的记载比比皆是。

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大约从公元前 5000 年至前 2600 年，在长江流域中游的两湖地区，主要是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下游包括太湖流域主要是崧泽文化。

我国的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大体上相当于龙山文化的时期，这时期铜器的使用逐渐加多，除红铜外还有青铜和黄铜。各地考古学文化都有明显的发展，更加逼近了文明的大门。在这个时期，除良渚文化外均已发现铜器。铜器分布面的扩大的数量的增加，显示它已越过最初的发展阶段而到达了铜石并用时代的晚期。

在龙山文化的遗址中有五处发现了铜器或铜炼渣^②。其中有山东胶县三里河的两段残铜锥，诸城呈子的残铜片，栖霞杨家圈的一段残铜锥和一些炼渣与矿石碎末，日照尧王城的铜炼渣和长岛店子的残铜片等。

杨家圈的矿石经鉴定主要是孔雀石，即碱式碳酸铜。三里桥的两件残铜锥虽然不在一起，并且是先后两次发掘时发现的，但从其形状和粗细的程度相象、断口大致能对接、发份和金相组织也都相似来看，可能原属一件标本而于早期残断所致。这件铜锥是铸造而成的，对金相组织的观察发现有树枝状结晶，组织不均匀，成分也有较大偏析。其中含锌约 20.2%—26.4%，锡 0.35%—2.15%，铅 1.77%—4.26%，硫 0.053%—0.43%，铁 0.585%—0.93%，硅 0.043—0.11%，除铜、锌外，其余成份应为杂质。由于其中含硫，并与铅化合成为硫化铅，说明原料是不纯的，熔炼方法也是原始的。

^① 见吴曙光《永登“薛家湾人”族源初探》，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2001 年 5 月

^② 见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 年第 1 期。

据推测这件锥可能是利用含有铜、锌的氧化共生矿在木炭的还原气氛下得到的。而山东胶县附近的吕潍、烟台、临沂等地区，铜锌或铜锌铅共生矿资源十分丰富。因此在龙山文化中出现质地不纯的黄铜，是并不奇怪的。

中原龙山文化也有多处发现铜器或炼铜遗迹，一是河南郑州董砦的方形小铜片，二是登封王城岗的一件残铜器片，三是临汝煤山的炼铜 锅残片，四是山西襄汾陶寺的铜铃等。

在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遗存中，最近也发现了许多铜块，地点在湖北天门石家河。

上述情况说明，在龙山时代的确已普遍使用铜器。最普遍使用的是锥，其次是刀匕之属，其它则有斧、钺、指环、铃、镜等，即一些小件的手工工具、梳妆用具、装饰品和乐器等，应用的范围还是很有限的。铜器的成份中，绝大部分属红铜，也有少数为黄铜或青铜。

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大约从公元前 2600 年至前 2000 年，正是龙山文化及其同时代诸文化活跃的时期。这时期民族文化区已经萌芽，龙山文化分布于黄河下游山东的苏北一带，当是苗夷的史前文化；长江中游在屈家岭文化之后是石家河文化，应当是苗蛮各族的史前文化；长江下游至杭州湾一带是良渚文化，它也属于苗越集团的史前文化的一支。这一阶段在长江流域已普遍发现铜器，种类包括手工工具、装饰品、个别生活用品和乐器。尤以东方沿海一带为甚。

第二节 “衡山”、“汶山”间的青铜器文化遗存

蚩尤在中原战败被杀以后，其南逃的那一部分族人，且战且走，逐步退回其先民发祥地——“衡山”以南的今鄂、湘、赣、皖四省及其周围临近省市的边缘地区，与留居在这一带的原居民——他们老兄弟的子孙们重新聚合在一起。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认为：“衡山并非今日江南之衡山，其地望应在江北，似指今日江淮分水岭之桐柏山、大别山一线”^①。因为衡山南北原居民同是九黎部落联盟者。他们在语言、经济生活和文化形态等方面大体一致或大同小异，因而，他们很快就能比较容恰、比较和睦地相处在一块，在当地居民的帮助下发展生产，重建家园了。在时隔五、六千年后的今天，从考古资料中所能发现的他们留在地下的铜文化遗存虽然不及夏、商、周帝王都城那样富有，但从一些已发掘的部分青铜器遗物中，同样可以窥见那灿烂夺目的古代辉煌。

夏、商都会附近的三苗铜文化遗存

1、二里头青铜器文化遗存（公元前 1900——前 1600 年），被鉴定为夏代早期青铜器。二里头文化遗存得名于今河南省偃师县洛水南岸郭城东南角的二里头村，包括其附过的疙当头村，四角楼村，北许村和 羊庄之间的范围在内。不少考古学家认为，二里头青铜文化遗存与“河南龙山文化有继承关系”^②。河南洛水南岸二里头、北许村一带，在炎、黄、蚩大战中原之际，尚属于蚩尤的九黎部落联盟范围，炎、黄集团仅在河北平原西部活动；在蚩尤战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蚩尤部族只是从河北退居河南，大约在唐尧及夏初的近千年时间内，洛水南岸一带，仍属蚩尤部族的子孙们居住。从尧、舜、“逐三苗”以后，三苗才从河南逐渐南退湖北。据考，大禹治水，也只是在济南淮北、河东的范围之内。《史记》引《汤浩》（尚书）载曰：“古岳……民乃有空。东为江，北为济，

^① 《中国通史》（上古时代）P189

^② 网络下载资料《青铜器起源与青铜器时代》

西为河，南为淮。^①”由此看来，夏初，其疆域尚在淮河以北。因此，在夏初偃师及洛水以南地区的铜文化遗存中，其中与龙山文化有继承关系的那一部分，很有可能是三苗文化遗存。

2、二里岗铜文化遗存（公元前 1620-? 年）

二里岗铜文化遗存因其与商汤立国同期，故当今考古学家认为是商代青铜器文化遗存。二里岗文化是因郑州市东南二里岗青铜器遗址的发掘而得名，与二里岗同时代文化前有河南安阳市殷墟遗址，后有偃师尸乡沟遗址。与之同认为是商代文化的青铜器遗址在今湖北黄陂盘龙城，湖南宁乡、醴陵、常宁、湘乡、衡阳、湘潭等地；江西吴城，安徽嘉山泊岗等地，也发掘了不少。而这些地方，当时全在三苗疆域之内。后来，三苗是被打垮了，但其遗民仍在这块土地上生活。据史书所载，在整个商朝时期，打着三苗旗号的三苗民众“仍在湖湘间”，直至春秋时期。据考，偃师的“偃”，与尸乡沟的“尸”，都是从苗夷的“夷”字想象出来的。南徐偃王是一个反抗西周统治的英雄人物^②，可见，偃师及其尸乡沟一带，在夏、商、周三代直至楚国，都是蚩尤后裔——三苗及其遗民——蛮夷住居地。其地下遗存，从时间上来看，当然在夏、商、周三代之中；但从地理位置来看，还不能完全排出三苗及其遗民的首创。

3、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所处大冶县，县内现已发现的采矿遗址和冶炼遗址就有近五十处，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就是其中之一。遗址所处的铜绿山矿区为一接触交带型矽卡岩矿床，蕴藏着丰富的铜、铁、金、银等矿石资源，矿体埋藏浅，品位高，储量大，易于开采。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古矿遗址中年代久远，生产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处古铜矿遗址。其分布范围约两平方公里，地表遗留的古代矿渣在四十万吨以上。从 1974 年起先后对 1、2、4、7、11 号矿体进行了考古发掘，已清理出西周至西汉（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一世纪）千余年间不同结构、不同支护方法的竖井、斜井数百座，平巷百余条，以及一批春秋（公元前 770—前 476 年）早期的炼铜竖炉。随同出土的还有大量用于采矿和冶炼生产的铜、铁、竹、石制生产工具。这些都真实地记载着中国矿业发展的悠久历史和卓越的技术成就，为研究中国古代矿冶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一批珍贵的实物资料，集中地完整地反映了中国青铜文化时期采矿生产中井巷的开拓与支护，矿井的提升、排水、通风、照明等一系列技术水平。作为遗址永久保留的 7 号矿体保护范围约五万平方米，经考古勘探和考古发掘证实，该矿体的古矿井遗存有四处。其中 1 号距今 2700 年；2 号古采区分布范围 260 平方米，埋藏深度 14.66 米，地表千部进行了考古发掘。C14 测定的年代距今 3200 年左右，时代为商代晚期至西周。

综上所述，屈家岭在江北，大冶在江南。至于盘龙城，宁乡，醴陵、湘潭、衡阳等地，都是在“衡山”、“汶山”之间，历史上属于三苗疆域，及至荆楚，仍然是三苗遗民——蛮夷之地。在这些地方能发现如此之多的青铜器，这决不是黄帝族人所为，而是蚩尤后代三苗及蛮夷所创造的古文化的灿烂辉煌。

^① 引自《史记·殷本纪》（第三）

^② 参考《中国通史》（上古时代）P1001-1002

第六章 “铜头铁额”的九黎、三苗

苗族先民使用铜加锌、锡或铅等“有意识”的合金，年代较早。约于公元前4600余年蚩尤部族用于作战的戈、矛、剑、戟、铠等兵器，就已经属于青铜或黄铜器了。同时，在早于中原商殷文化的湖北京山的屈家岭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早于殷商文化的铜剑残片。^①这足以证明，古三苗蚩尤部落使用青铜器，不管是在黄河中下游还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都是远远早于商周。可是早期使用这些“有意识”的合金，只是制作简单的小件兵器或工具，且掌握这门制作技术的范围太窄，能见于史书记载的只有蚩尤部族，推而广之，也只局限在古三苗——九黎部落联盟之内。因此，中国史学界认为我国青铜器以礼器为主体，把青铜礼器看着是青铜时代的主要征象。而出土的年代较早的青铜礼器，又比较集中在河南偃师县洛水南岸的二里头村。史家们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青铜遗址，推测其为夏代青铜器遗址；商代青铜器遗址是以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遗址”和郑州商城遗址——郑州市东南郊的“二里岗青铜遗址”，以及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周代青铜器遗址是以周人早期活动的根据地“周原遗址”，在今陕西西部武功、岐山、凤翔等地一带台地，范围约两百余平方公里。

从以上情况来看，我国青铜器遗址大都集中在夏、商、周三代帝王都城及其祖居之地。其他地方，一是未被发现或未予发掘；二是铜器可回炉再生，不会轻易埋于地下；此外，三代都城所发现的青铜器是以礼器为主，多半是帝王官宦的随葬品，一般劳动者没有那么富有。更何况蚩尤后代是在中原战败迁逃的，早年所创造的财富，包括开采的铜矿及一切设备和技术资料，都留给中原大战的胜利者黄帝族人了，自己一贫如洗，还能有什么宝贝埋在地下呢？因此，我们只能根据地下遗存和史书记载这些有限的资料，来描述青铜器时代蚩尤后裔所能留下的文化遗存及其社会发展情况。

第一节 铜石并用时代的九黎部落

从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进程来观察，自金石并用时代至铁器时代，是阶级社会形成的时期。一般认为，阶级社会形成的过程最初发生在公元前第4千纪两河流域和尼罗河谷地的金石并用时代。在中国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阶级社会形成的具体年代还很难定论。不过，从多种历史典籍对苗夷特别是对蚩尤集团的记载，似乎在那个时代，苗夷已经有了军队并使用了金属兵器；已经有了刑法，虽说是“五虐之刑”但却能按照不同程度的罪而处以不同程度的刑；已经有了人们作为精神支柱的宗教，虽然尚处在“趋鬼祭神”的原始阶段，但却起着规范人们思想意识的作用。在那个时期，是否属阶级社会，还很难以一个统一的标准去衡量。但史实足以表明，那是一个由氏族发展到部落乃至由部落向部落联盟性质的方国跨进了一大步。

由于史料和传说都相当缺乏，古代苗族先民的社会状况，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能依据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一般性来描述苗族先民在古代所处的一般状况，对于这一时期的社会状况作如下论述：

^① 参考《京山县志》（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P781—785

在这一时期，生产有较大发展。在农业方面，锄耕农业被犁耕农业所取代。起初是木犁或石犁，后来用金属犁。犁的使用不但提高了劳动效率，也扩大了耕地面积，使农业生产日益专门化，出现了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活动的部落。另一方面，在其他适宜于经营畜牧业的地区，出现了专门从事畜牧业的游牧部落。从而在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形成了第1次社会大分工。

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使手工业日趋复杂。金属的冶炼和制造、制陶、制革、纺织、酿酒、榨油等手工业越来越专门化，导致手工业和农业分离，出现了第2次社会大分工。

两次社会大分工促进了交换的发展。在第2次社会大分工之后，出现了商品生产，原始的货币也随之流通起来。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经营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出现了，恩格斯把商人的出现称为第3次社会大分工。

随着生产的发展，犁耕农业和畜牧业成了主要的生产部门，男子的劳动在农业和畜牧业中都占主导地位，妇女的家务劳动和男子的劳动相比较已显得无足轻重。男子在生产中地位的提高，改变了他们在氏族中的地位，而私有制的产生又使男子成了财富的所有者。于是母系氏族被父系氏族公社所取代。在父系氏族公社内，出身和世系按男子的系统计算，实行父系财产继承制。母权制时代的夫居妇家制度变成了妇居夫家制，不稳定的对偶婚逐步向一夫一妻制过渡。

父系氏族社会由若干家长制大家族所组成。一个家长制大家族包括几代男系亲属，他们共同居住，共同劳动和消费，成为父系氏族的基本社会经济细胞。但土地仍归氏族所有，耕地定期分配给各大家族使用。

父系氏族还保留着若干民主的性质，但氏族首领改由男子担任，氏族议事会由各大家族的族长组成，原来由全体成年男女参加的氏族议事会，现在由全体成年男子参加。妇女地位逐渐下降。

生产力的发展，使产品除维持劳动力的需要之外还有剩余，这就为私有制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同时个体劳动逐渐代替集体劳动，一些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从家长制大家族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家庭经济体系。生产工具、牲畜、农产品等首先成为家庭的私有财产，后来一部分土地变为私有。剩余产品的出现，提供了剥削别人劳动的可能。在第1次社会大分工的过程中产生了第1次社会大分裂，即分为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两大阶级。到第2次社会大分工后，奴隶制和各种形式的奴役有了进一步发展。氏族内部发生了财产的分化，一部分人成为富裕的氏族贵族，大多数则成为贫困的普通公社成员，他们之间产生激烈的斗争。父系氏族公社末期，氏族的血缘纽带越来越受到冲击。某些破产的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的氏族成员往往脱离自己的氏族，到别处和与他们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们杂居，同时氏族也不断接纳外来人，于是出现了按地域划分的农村公社，它是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社会经济组织。在公社内，土地公有，定期分配给各家庭使用，同时山林、湖泊、坡地等也归公有；另一方面，住宅及宅旁的小块园地、农产品、生产工具、家禽家畜等等都归各家私有，所以农村公社具有“两重性”。随着历史的发展，定期分配的土地逐渐变成私有，公有制遭到破坏，农村公社式的家族组织也随之解体。不过，从苗族传说中分析，由于苗族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和特殊的社会地位，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出现之后，农村公社仍长期保留。

在铜石并用时代，石器制作技术已臻完善，农业生产进一步提高，物质文化的内容逐渐丰富起来。不同地区之间和同一地区、同一人们集团内部的分化都明显加深，而家庭的结合则日见稳固。从前分散的部落逐渐结成联盟，中国聚落和城堡相继出现，掠夺性战争愈演愈烈，最后导致了原始社会的解体。

一、苗夷文化大融合

开发长江中下游和江淮一带的发明农业、栽种禾苗（水稻）的“苗”民，包括早期生活在湘、鄂、赣、皖和江泽一带以栽种禾苗为主业的原居民，据考，吴人亦即蛮夷人^①，在江淮一带创造了极其辉煌的东方文明，因而有玉蟾岩文化、彭头山文化、万年洞文化、河姆渡文化、大墩子文化、和良渚文化等古代灿烂的文化遗存。但在距今 7500 年至 5000 年之际，由于地质气候的巨大变化，趋使他们离开故居，向北边的今鲁、豫、晋、冀等黄河中下游地区进发，出现了原始社会末期的苗文化北移和苗夷文化大融合。

据我国地质史和地下动植物化石特别是对孢粉组合的分析发现，在距今 7500~5000 年前，长江中下游洞庭、鄱阳、巢湖、太湖、洪泽湖等五湖地区，气候由北方期（第二凉期）转变为大西洋期（第一暖期）。气候暖热潮湿，年平均温度比目前高 2~3℃，降雨量比目前多 500~600 毫米，五湖地区基本上是水乡泽国。洞庭湖及武汉地区是云水相连的云梦泽；鄱阳湖及宿松、望江一带，是九江合一的彭蠡泽；太湖南北则是江淮合流的震泽。在那个时期，西边的造山运动剧烈，喜马拉雅山脉拔地崛起；而东边地地势则日渐下沉，海水上涨约 50 米。

近年水文学的研究，有一种意见表明，大约在一万年前，也就是新生代第四纪冰川期以后，中国南部地域气温升高，冰川融化；也有说，天象的变化下注了大量的雨水，所以，海水不断上涨，从而即开始了一次新的海浸。陆安《淮南子·览冥训》对这次水荒描述道：“往古之时，四极度，九州裂，天不兼复，地不周载，火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约在六千年前，这次海浸达到顶峰。加之，新华夏地质运动的茅山等上升。故如今的南京、镇江、蜀、岗、盱眙、伊庐山、马陵山等，都在海滨，甚至江西九江也是海滨之地。那云台山、狼山、虞山等，也就都在海中了（《吴地记》等）。如今的浙江甬东、会稽、句章，当时亦“东海中洲也”（《吴越春秋》卷三）。同时，这次地质变化是十分复杂的，同一经纬度地区，有些地方增高，有些地方下沉降低，近来地质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茅山则上升，长江中段则下沉，南畔地带乃上升，江浙福建有升有降的，于是长江成为西来的大干河、太湖则不断下沉”^②这一带，有些地区地表下 25~30 米处，即能见到海相沉积地层（《镇江文史资料》增辑）。汉刘安《淮南子·原道训》称，“共工之力触不周山，使地东南倾”，实际上，这是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所致。而不周山南端，即今天目山北地块（《淮南子》），文献与地质考察完全投合。

这场海浸，《史记》记载，帝尧时中国有一次特大的洪水，“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淮南子》载“江淮通流，四海溟涔”、“民皆上丘陵赴树木”。其年代可能在五、六千年前时期。

对此，在江苏远古遗址里有反映，五十年代发掘的南京鼓楼岗西、金川河畔的北阴阳营遗址地层里，曾发现有一女性蹲抱着一盛玉罐的骨架形态（“俯身葬”），其周围是黄土。我们认为这可能与当时一次大洪水泛滥有关，是突发性的洪水带来的大量泥土，把她掩埋死的。它的时代，距今五千到七千年间。

这个时期的情形，在传说和神话中也有反映。例如共工怒触不周山（《淮南子·天文训》），其结果，导致天倾西北，地陷东南。从此日月西逝，江河东流。原来的天柱、地维不合理，由于他一怒

^① 《吴越文化论》——东夷文化之光，王少华，P17~23 页

^② 《吴越文化论》——东夷文化之光，王少华著，P40。

而触不周山，其时，又有女娲与伏羲（包羲）炼五彩石以补天，于是天地得到了改观。苗族传说女娲伏羲氏是苗族的祖先^①。《中国通史》云：苗族以伏羲为其祖先。清初陆次去的《峒溪纤志》说：“‘苗人腊祭曰报草，祭用巫，设女娲、伏羲位’。……按他们的传说，苗族全出于伏羲与女娲。他们本为兄妹（或姊弟）……配为夫妇，绵延人类^②。这个神话传说的内容，应该相当古老，它既反映了远古人们对人类起源的猜想，又反映了我国远古曾存在着的血缘家族制度。在传说中，女娲的事迹比较丰富，她被苗人尊之为祖神，其所受崇拜之地位，也高于伏羲。

就在那样一个天翻地覆的特大洪水时期，导致了五湖地区，特别是江淮一带“苗”民面临着灭顶之灾。这一带“苗”民，及其所创造的灿烂的苗文化，包括他们的聚落、城市和那肥沃的田园，甚至是一片片黄橙橙的即将收割的稻谷，在几天甚至一夜之际卷入洪涛巨浪之中，永远湮没于海底泥沙之下。据西洋探险家报告说，在太平洋中发现了海底城市。有相当完整的街道、住宅、石柱、石像等等，潜水员还摸出了十分珍贵的珠宝和黄金首饰之类的东西，并描绘那些巨石达 25 吨之重，如此等等。这些实物，显然不是近几千年人们所能创造出来的。还有一些著述说，古城的居民崇拜太阳神，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准，这些具有高度文明之地，是人类文明的摇篮^③。当然，对那些海底古城，我们不能身亲目睹，所说是否是真，又是否与苗族先民有关等等，我们不能轻下结论。可是就在那样一个天翻地覆的特大洪水时期，迫使一些没有被淹没幸存的“苗”民北移，带着自己的苗文化，逐渐与冀、鲁一带原东夷集团融合在一起。

大约在公元前 7500~5000 年之际，江淮五湖地区，出现了苗文化北移和苗夷文化大融合的现象，这是从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中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的。考古学家们发现，龙山文化是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出现的；而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都有屈家岭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影响和深入。不少学者对这一问题形成了共识。例如华林东说道：“早在二十世纪 30~40 年代，有人就掀起了‘中国文化西来’，这种观点已不攻自破。也有一些学者在‘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摇篮’说的影响下，主张良渚黑陶是山东龙山文化黑陶传播的产物。今日众多的考古发现和碳十四年代测定，不但说明了良渚文化的上限要比山东龙山黑陶早，而且还证实了龙山文化曾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④”此外，从道县玉蟾岩文化、洞庭湖彭头山文化、江西万年洞文化，以及良渚文化和河姆渡文化等分析研究，发现自距今 8000~6000 年左右，这些文化大都中断了一至两千年。这些文化到哪里去了呢？显然是苗文化北移至豫、鲁、冀及中原地区去了。同时，文献资料也表明，在远古时代，苗蛮北进中原，与北方部落争夺黄河南北平原。范文澜先生认为：“中国中部黄河流域，是平原肥沃的地区，住在周围的各种族，都想迁徙进来，因此，成了各种族斗争的舞台。也成了各种文化相互影响的场所……南部蛮族主要为苗蛮，由长江流域北进到黄河流域；西部是羌族，从西方侵入中原，与苗黎族杂居。”

苗夷文化大融合，导致了早期中原文化多元性，进而出现了多元一体的大格局，促进了中原文化大发展。苗夷文化大融合首先是苗文化北移和夷文化南下，而后苗夷文化同注入中原实现的。产生于长江中下游五湖一带的苗文化，最突出的特色就是禾苗（水稻）文化，禾苗的祖原起于洞庭湖一带的玉蟾岩文化、彭头山文化和鄱阳湖一带的万年洞文化以及太湖一带的河姆渡文化等等。这一带的原居民以栽培禾苗为主业，因而苗文化是其最本源、最突出的特色文化。苗文化的特征也就是定居的农业文化。苗文化沿着大别山以东以西两条路线进入鲁、豫等黄河中下游平原，大大促进了

^① 参见《中国通史》（3）（上古时代）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P173~199 页

^②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237-238 页）”

^③ 参见陈靖《苗族祖民与山水文化》以及《魔海龙三角》、《消逝的大陆》、《姆大陆的子孙》等书。

^④ 华林东《良渚文化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 123~126 页）